

目 录

兩广“六一”事变·····	劉 斐 [1]
一九二八年粵桂战争·····	黃紹竑 [35]
三一八惨案亲历記·····	楚溪春 [54]
一块銀元和一張收据 ——張學良枪斃楊宇霆、常蔭槐和收买日本 政友本党的内幕·····	王家楨 [58]
中村事件真相·····	董昆吾 [72]
閻錫山在大連时期山西各派的斗争····· ·····	南桂馨 趙承綬 趙丕廉 [76]
我与政学会·····	李根源 [82]
西原借款内幕·····	葉恭綽 [106]
禁卫軍之建立与改編·····	載 濤 [112]
北洋軍的建立·····	張聯榮 [117]
袁世凱之再起与吳祿貞之死·····	惲寶惠 [127]
陝西革命艺人李紫恒·····	張 鈞 [131]
談梁任公·····	周善培遺稿 [133]

附注

对《两广“六一”事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二页

对《三一八惨案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二九页

对《中村事件真相》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八页

对《我与政学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〇页、第三十一辑二九一页

对《北洋军的建立》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七〇页、第三十一辑二九二页

对《谈梁任公》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

兩廣“六一”事變

劉 斐

兩廣事變爆發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簡稱“六一”事變。它涉及的方面很廣，關係兩廣軍政人員的事情很多。我同廣東軍政界接觸太淺，同桂系往來先後也只有三個短的時期。第一次是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我在南寧講武堂學習，旋參加馬曉軍部響應孫中山先生援桂的百色起義。起義失敗後，我就回到湖南去了。第二次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我在西江講武堂學習，畢業後任白崇禧的參謀長，從梧州進軍開始，到掃清桂、柳一帶的陸（榮廷）、譚（浩明）殘部、統一廣西止。我因當時主張同廣東合作，被派在廣東方面作聯系工作，一直到出師北伐，攻下南昌後（一九二六年冬），我就到日本留學去了。留學七年之間，對國內歷次事件（如蔣介石叛變革命與寧漢分裂又合作，西征討唐（生智），蔣桂，蔣馮，蔣、馮、閻各次內戰，及對江西紅軍的五次“圍剿”，我都没參與，只在報上見到一些報道。第三次是一九三四年我從日本回國，又到了廣西。這時我專來往各地從事抗日反蔣活動，對桂系內部事務，所知並不多。尤其兩廣事變的前一階段，活動重心在廣東，我沒參與過陳濟棠內部的策劃，故對當時廣東情況，知道的有限。加以事隔多年，當時的見聞，有許多已經淡忘。所以，從反映整個事變的情況來說，這個回憶錄是極其挂一漏萬的，只能說是一個極

簡略的梗概罢了。

一、西南方面与蔣介石对立的历史过程

“六一”事变前，西南方面与蔣介石的对立，主要是粵、桂两省軍閥与蔣介石的对立，其中以桂系軍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人物。

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是从旧桂系陸榮廷、譚浩明的林虎部和馬曉軍部分化出来的。远在一九二一年，中山先生遣粵軍(陳炯明所部熊路等)援桂，并亲自到桂林誓师准备北伐时，桂軍馬曉軍部在百色起义，响应孙先生。陸、譚前綫因頂不住粵軍的压力，就向百色后方退却，他們以两万多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劣势的馬曉軍部(一千多人)于百色城内，将其全部繳械。当时白崇禧和黃紹竑都是馬部的营长。白崇禧只身由城墙上跳出来，率领駐城外仅存的一个連(我即在这連)逃到黔、桂边界。后来粵軍繼續深入到百色，白部才在粵軍支持下从黔、桂边界經百色到了南宁。这时，白因在行軍中跌伤了腿，要离开队伍到广州就医，于是把部队交黃紹竑率领。黃在白养伤期間，乘那时旧桂系內部紛乱和混战的机会，联合陸榮廷所部林虎的統領李宗仁，协謀統一广西。当时李宗仁称为定桂軍总司令，黃紹竑称为广西討賊軍总司令，得到李济深由广东方面的援助，逐渐扩大了势力。一九二四年白崇禧伤愈回到广西，李宗仁、黃紹竑各以所部的主力交白崇禧指揮，由白担任定桂、討賊联軍前敌总指揮，对广西各地的陸(榮廷)、譚(浩明)殘部从事有计划的扫蕩。他們經過約一年多的作战，到一九二五年完全消灭了旧桂系的势力，統一了广西，开始建立了李、白、黃等对广西的反动統治政权。实际在軍事上东征西討的，完全是白

崇禧。因此，白获得了“小諸葛”的称号，成为桂系的中心人物。

这时，广东已成立国民政府，并已肃清东江，完成了全省統一。我和李任仁^①都主張拥护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主張两广合作，以便出师北伐，打倒北洋軍閥。这个主張得到白崇禧的同意，他并派我去广东联系。这时，李济深也正在策动南宁方面的李宗仁、黄紹竑，要他們与广东合作。我到广州后，得到譚延闓、程潜等的支持，和那时的党政当局汪精卫、譚平山、廖仲愷等会晤，把两广合作、出师北伐等問題的初步方案談妥了，他們並希望白崇禧去广州作具体的商定。我回到广西，向白崇禧說明了广东方面的情况和态度。白馬上到南宁同李宗仁、黄紹竑进行了他們的內部协商，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后，就由白正式代表他們，和我一道去广州，經過数度會議，确定了两广統一，并准备出师北伐。

在北伐时，由李宗仁把广西部队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七軍，开赴前綫作战；黄紹竑为广西省主席，留守广西；李济深为总參謀长，留守广东；白崇禧为副总參謀长，随总司令部赴前方指揮作战。我当时也在总司令部工作，到一九二六年冬攻下南昌后，才辞职赴日本留学。

桂系在北伐戰爭中，很順利地扩大了势力。他們先同蔣介石
一落千丈了左派，一九二七年八月政变不成功后，桂系力量亦告

唐生智反对特別委员会，認為違法篡党，派所部刘兴至当塗，向蕪湖挑畔，因而发生了西征討唐的宁、汉战争。唐虽拥有湘、鄂、皖三省地盤，但因何鍵不愿打，粵、桂軍又进入湖南策应討唐，唐被迫下野。桂系乘机改編了唐的部队，又取得了武汉的地盤。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复职，繼續北伐到北京后，白崇禧以第四集团軍前敌总指揮名义，肃清津东一带的直魯殘軍，屯兵唐山，且阴結关外的楊宇霆，企图夺取張学良(張作霖已在皇姑屯被炸死)的家底。

那时，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黃紹竑留守广西老巢，桂系势力擴張迅速，并且凌駕在閻(錫山)、馮(玉祥)、張(学良)之上，因而成为蔣介石的唯一勁敌。李宗仁想把南北的桂系势力联成一片，企图夺取湖南，就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不經中央政治會議批准，逕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的职，以傾向于桂系的何鍵为湖南主席，并派兵两师逼走魯滌平，支持何鍵于三月一日就职，且繼續进攻退在常德方面的魯部譚道源师，經蔣制止无效，遂演变成为蔣、桂战争。

当湖南問題发生后，蔣以請李济深从中調处为名，把李誘騙(听说系吳稚暉担保)到南京，軟禁于湯山。白崇禧想在北方策应武汉，蔣介石秘密起用下野赴日的唐生智由天津潜赴唐山，策动被桂系西征时改編的唐旧部驅白。白因变起倉卒，只身由天津逃至大連，再轉香港回到广西。

蔣介石于三月二十五日正式下令討桂，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二十九日亲赴九江指揮大軍进攻武汉，同时收买桂系的李明瑞倒戈，迫使桂系守将胡宗鐸、陶鈞不战而放弃武汉，退至鄂西一带，旋即投降。时李宗仁在上海被阻，不能回武汉

指揮，武汉失守以后，他也从海道逃回广西。

李济深在南京被軟禁后，李部的陈济棠等在广东主和，于三月三十日通电拥护“中央”，限令在粤桂軍离开粵境。陈济棠从此开始掌握粵軍实力，并在某种程度上替蔣介石担負了監視广西的任务。

那时黄紹竑正由广西去广州，看到广东起了变化，立即中途折回梧州。四月十日白崇禧由香港到达梧州，白、黄相見后，力主繼續作战。不久李宗仁也由上海到来，借口受許多中央委員和党内先进的敦促，自称为护党討賊軍总司令，集中兵力于西江，大举侵粵，声言討蔣。

蔣于五月四日下令免去黄紹竑的本兼各职，再行討桂，以湘軍何鍵部和粵軍陈銘樞部分路进攻广西。桂軍屢战失利，李、白、黄于六月下旬通电下野。蔣任命俞作柏为广西主席，以李明瑞部駐防广西。湘、粵軍班师，各自离开广西回省。

在北伐时，張发奎曾一时以偽装“左派”博得一些人对他的好感。到南昌起义时，張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公开地反革命了。他因不容于唐生智，就把部队带回了广东，受李济深指揮。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間，李济深和汪精卫赴上海开会，張突然解除桂系黄紹竑等的武装，桂系大憤。正相持間，适广州暴动爆发，張部共产党人参加了暴动，張发奎才被迫下野。到蔣、桂战争时，蔣为了利用張倒桂，又起用他为第四师师长，参加对武汉方面桂系的作战，桂系的胡、陶失败后，張就駐防在鄂西宜昌、沙市一带。到一九二九年九月間，蔣命張部移防隴海綫，張疑蔣要解决他，拒不受命。适值汪精卫由法国啓程回国，張通电欢迎汪回国主政，同时为了保全实力，把部队由鄂西移駐湘西。蔣以擅自調动军队的罪名，将他撤职查办。同时，亲汪的广西省主席俞作柏与师长李明瑞为声援張

发奎，于九月二十七日宣布广西独立。蔣命湘、粵軍防堵張发奎，并免俞作柏职，以吕煥炎为广西主席。張发奎部由湘西进入广西时，适值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策动广西旧部驅逐俞作柏成功，重新拥有广西地盤，并与張发奎合作反蔣，于十二月間协助張发奎进攻广东。蔣命何应欽督粵軍陈銘樞、陈济棠部于十二月十二日前后，在广州附近及花县一带剧战数晝夜，結果桂軍失敗，退回梧州。

到一九三〇年初，蔣乘蔣、馮战争胜利之后，屯大軍于河南，閻錫山感受威胁，遂酿成閻、馮联合反蔣。閻于二月电蔣謂武力不足以統一，愿与蔣共同下野。李宗仁即通电推閻、馮、張(学良)为陆海空軍总、副司令。于是閻、馮再通电主張以总投票解决党爭，汪精卫复电贊成。到三月間，二(馮)、三(閻)、四(李)集团軍將領通电劝蔣下野，共推閻、馮、張、李为陆海空軍总、副司令。四月一日，閻、馮、李分別在各所在地就职，逐漸发展为蔣与閻、馮之間的中原大混战。汪精卫旋亦参加这个反蔣集团，在北方召开扩大會議，以召开国民會議、頒布訓政时期約法及召开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等相号召。同年九月，他們在北方組成了所謂国民政府。那时，桂系李、白、黃和張发奎为了全力策应閻、馮在中原作战，曾于六月初傾巢而出，大举进攻湖南，迫何鍵于六月四日退出长沙；八日桂軍进占岳州，武汉为之震动。蔣令粵軍进入湖南截击桂軍后路，迫使桂系放弃长沙、岳州，退回广西。黃紹竑在退却到广西边境时，忽然反桂投蔣。从此，桂系退保广西一省，編練民团，以解决广西兵力不足的困难；对外則联系一切反蔣力量，尤注意結好广东的陈济棠，希望能重新建立两广合作的局面，造成間鼎中原的有利形势。

当时蔣因張学良入关，取得了對閻、馮的中原大战的胜利，扩

大会議已接近垮台，广西軍隊也已敗退。蔣为了进行他的政治欺騙，就于十月三日进入开封的那天，电国民党中央主張定期召开国民會議，頒布訓政时期約法，企图进一步把汪精卫的旗帜拿过来，以巩固自己的統治。国民党中央慑于蔣介石的威势，決議于翌年五月召开国民會議。但这个決議和胡汉民的“訓政裸婦論”相冲突，而且这些主張又是汪精卫在扩大会議搞的把戏，胡始終不以为然，常在閑談、講演或文字中加以疵議。到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晚，国民党全体中委在蔣宅討論約法問題的时候，蔣、胡的意見相左，竟形成了當場正面冲突，蔣当夜就把胡汉民軟禁于南京湯山。国民党的粵系中委及西南实力派議論紛紛，首先由陈济棠于四月二十八日通电責蔣，繼由监委邓泽如、林森、蕭佛成、古应芬等联名通电責蔣。孙科、王寵惠、汪精卫等亦相繼赴粵，于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員非常會議，推定委員十六人成立西南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名目上是粵系，实际是合国民党的所謂“左”右派和桂系一起組成的。桂系在广西整伏一个时期之后，乘此机会又伸出头来，走上了西南政治舞台。

这时，蔣介石采取怀柔政策，声言对广东不采用軍事解决，而专注意于江西“剿共”，并且由蔣御用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決議仍以胡汉民为国府委員，且恢复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任为国府委員。会后，蔣就去南昌专事“剿共”。是年九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內部迫于全国抗日高潮，都感到有“团结”的必要，于是協議由粵、滬双方同时召开會議。經過許多周折，蔣介石曾一度下野，到一九三二年元旦才成立統一政府，原由广东非常會議成立的西南政府于一月五日通电撤銷。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謂均权分治的“国民党中央委員會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員會”和“西南

軍事分会”，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

陈济棠本是李济深部的师长，北伐时随李留守广东，因势坐大，逐步升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蒋、桂战起，李济深在南京被扣，陈通电拥蒋驱桂，以后又暗中迫走陈铭枢（广东主席），取得对广东的统治地位。他因不是蒋的嫡系，时时怕蒋搞掉他，所以他要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来作他的政治屏障。在元老派声势强大，如到广州来举行非常会议等反蒋活动时，他极力支持，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并维持西南的半独立状态。同时，他又怕西南方面反蒋更坚决的人——如李济深或桂系的李、白等会起而代他，所以在元老派内部四分五裂、力量衰微时，他又暗中同蒋介石勾结，接受蒋的贿赂。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蒋派蒋伯诚坐驻广州，专门作收买陈济棠的工作，暗地里送给陈济棠的钱是很不少的。陈并且把余汉谋部派到赣南去协助“剿共”，为蒋效劳。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既要利用陈济棠作为反蒋的实力，又不满陈济棠患得患失、模稜两可的态度，且不敢过于逼他，以免他完全倒到蒋的方面去。陈济棠原先为了取得广东地盘，乘桂系失败时就拥蒋驱桂，作蒋的鹰犬，几次把桂系搞得不能出广西一步。到了他的地位巩固时，他又耍联系桂系，以便取得对蒋的威胁作用，来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可见陈济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一方面纵横捭阖，敷衍各方，互相利用，一方面又患得患失，始终不肯毅然反蒋，其唯一目的在于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

陈济棠有满脑子的封建迷信思想，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他的哥哥陈维周更到处看风水，满想找一穴龙眼吉地来移葬他的母亲，以便护佑陈济棠能取代蒋介石的天下。这种“不问蒼生問鬼神”的笑话是很多的。据说陈济棠很信他命带妻

財，因為從他當連長時和私娼莫秀英結婚以來，就一直官運亨通，說這完全是莫秀英的“八字相夫旺子”的關係。所以陳很聽莫秀英的話，連他修建的要塞炮台，也有取名“秀英炮台”作為吉利兆頭。至於賣官鬻爵，完全由莫一手包辦，更是當時眾人皆知的事。

從桂系方面來說，久經思起，正好利用西南半獨立狀態，企圖積極推動陳濟棠和其他方面組成反蔣的聯合陣綫。因此，李宗仁以西南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名義經常留住廣州，全力撐持西南政務委員會這塊招牌，專事推動反蔣的政治活動（他一面是折衝樽俎，與各方面進行拉攏，以擴大西南的政治影響；另一方面是為了堅定陳濟棠的反蔣態度，並企圖從廣州方面取得物質幫助），而把廣西家務完全交給白崇禧全權處理。我經常往來南寧與廣州之間，在廣州幫助李宗仁進行活動，並和國民黨留居廣州的元老派共同勸說推動陳濟棠反蔣。

記得我每次到陳濟棠那里去談話的時候，他手里經常端着一只水烟袋，我們談着談着，他總是說：“為章兄！我一定反蔣！”儘管他每次都開出反蔣的支票，但總沒見他兌現。他既想擴大地盤，又怕丟了老本，患得患失的心情老在折磨他。各方策動他反蔣的人，對他這種遲疑不決的態度都非常不滿；有時我也氣得跑回廣西去了。白崇禧便常常帶着挖苦的口吻說：“我們跪在豬欄門口喂豬，唯一目的是要豬肥嘛！只要豬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來的呀！”這說明當時推動陳濟棠反蔣，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只有後來蔣介石逼得他無路可走了，他才被迫走上反蔣的道路。

二、事變第一階段

蔣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保持比較均權的狀態，對胡漢民等國

民黨元老派採取敷衍態度，主要是為了集中力量來對付共產黨，但他並沒有忘懷兩廣問題。

當一九三六年一月間，胡漢民由歐洲回國時，蔣立即派居正等赴香港迎胡回南京，就是想解決兩廣半獨立狀態的步驟之一。那時，陳濟棠、李宗仁為爭取胡漢民這項政治資本，也趕忙赴香港迎胡去廣州，向胡表示忠誠，力請胡領導他們反蔣。胡漢民因對蔣宿恨未消，見陳、李他們也確有一些軍事力量，就聲言決不北上，留在廣州積極準備反蔣。不料到五月間，胡忽因腦溢血病故。蔣見時機已到，乃派居正、孫科等八委員以祭胡為名赴廣州，要求兩廣當局進一步加強全國“精誠團結”。很明顯，這就是要取消西南半獨立狀態了。

那時，日本帝國主義對華軍事侵略的魔爪，已由東北伸入華北。蔣介石簽定了賣國的《塘沽協定》、《何梅協定》之後，日本為了進一步要求華北五省的特殊化，就對華北大舉增兵，漢奸公開活動，浪人到處挑釁，並逼蔣簽訂所謂中日“共同防共協定”，氣勢洶洶，大有山雨欲來之勢。在西北方面，風傳張學良、楊虎城已與共產黨妥協，將發動抗日運動。蔣急於要解決西北問題，除已派兵到山西協同閻錫山堵截紅軍東進抗日的進路外，並以重兵調往潼關、洛陽各地，想逼張、楊繼續“剿共”，並乘機解決晉、綏、秦、隴的地盤問題。兩廣方面認為蔣既有事於西北，而日本侵略華北，局勢又顯得十分緊張，所以是假借抗日旗幟、進行反蔣的絕好時機。因此，當蔣提出徹底統一兩廣的要求後（外傳蔣曾提出五項要求，有無其事我記不起了），陳濟棠當然不願意，桂系則極力主張趁此時機反蔣。這時，陳濟棠若不共同反蔣，就會陷於孤立地位，他的“南粵王”的美夢就不能再做下去了。他感到與其坐以待亡，不如和桂

系一起反蔣，以便進可以爭取全國輿論的同情，擴大西南聲勢，進一步瓜分蔣介石的政權；退也可以使蔣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讓點步，以便維持西南現狀。

兩廣與各方密謀反蔣，早就有信使往還，許多地方軍閥多有代表駐在廣州，形成一種不定型的政治俱樂部。這時為了加強重點地區的聯系，陳濟棠和李宗仁就派陳的哥哥陳維周和我作為親密信使，去湖南聯系何鍵，要他和兩廣共同反蔣。何見到我們后滿口答應，他說：只要兩廣出兵，他馬上就擁護，但要求補助軍費，同時要絕對保守秘密，並指定以后由他的秘書長凌瑩負責和我們聯系。話雖如此，據後來了解，何鍵和我們接洽后，立即向蔣介石告了密，他用這兩面手法向雙方討好。

為了部署軍事，白崇禧又從南寧來廣東，和我一道到東江、北江等粵、桂邊境地區，視察地形，擬定作戰計劃，大體是：對福建和貴州方面採取守勢；對江西、湖南方面採取攻勢；粵軍主力集中在大庾、韶關地區，準備進攻江西；桂軍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區，準備進攻湖南，並在粵、桂兩省與各鄰省的邊境地區構築了防禦工事。

當時西南方面可能使用的兵力大體如下：

陳濟棠的第一集團軍，原有三個軍，軍長是余漢謀、陳濟棠（副軍長張達）、李揚敬，每軍三師，師長是莫希德、葉肇、鄧龍光、巫劍雄、李振良、李漢魂、黃延楨、黃質文、張瑞貴等。另外有個獨立師，師長是黃任寰，一個教導師，師長是繆培南，一個獨立旅，旅長是陳章，一個警衛旅，旅長是陳漢光，四個監警團及財政廳的兩個特務營。動員時，即以原來的獨立師和教導師為骨幹，擴編為四、五兩個軍，以黃任寰、繆培南為軍長。粵軍的編制每師是四個團，一起

約有七十個團，共計二十萬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原有兩個軍（第七軍軍長廖磊，第十五軍軍長夏威，副軍長周祖晃、韋雲淞，師長為王贊斌、覃連芳、蘇祖馨、賀為珍、程樹芬等），臨時擴編兩個軍（包括十九路軍的翁照垣師）；另外廣西民團已訓練有素，能作戰的有九十九個大隊；一起約十多万兵力。

兩廣兵力總計：陸軍部隊不下三十多萬人；空軍方面廣東有六個中隊（司令黃光銳），廣西三個中隊（司令林偉成）；海軍方面廣東有江防艦艇數十艘（司令張之英）。

蔣介石方面，兵力比較分散，隨着紅軍向西北長征，蔣乘機跟着紅軍走過的后方，對黔、川、康各省實行了軍、民、財政的統一，並分別派兵駐防：在北方以一部兵力進入山西，在潼關、洛陽一帶駐重兵，促張、楊繼續“剿共”，在閩、浙、蘇、豫、隴海綫各地，也各分別駐有一部分部隊。估計這時蔣能用于對付兩廣的兵力，不過十餘萬至二十萬人左右。

此時，蔣除將原駐貴州的薛岳所部威脅桂北邊境、以原駐福建的蔣鼎文所部威脅粵東邊境外，另調甘麗初部集中衡陽，陳誠、衛立煌等部集中湘、贛邊境，準備進攻兩廣；並將空軍集中在贛、湘兩省基地，以一部海軍集中廈門，準備從海空方面協同陸軍作戰。

兩廣方面準備好了之後，為了打出抗日的幌子，就先于五月二十七日通電反對日本增兵華北，以激起全國反日情緒，爭取輿論的同情，並積極延攬接納各方抗日反蔣人士；于六月一日公開揭起抗日旗幟，實際進行反蔣。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于六月二日以“冬”電通請中央領導全國從事對日抗戰，並通電全國黨政軍民各界吁請一致督促中樞領導全國從事抗日。

两广“冬”电发出后，立即动员两广各级国民党党部和群众团体纷纷响应，在两广各地举行宣传示威运动；同时由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率全体将领及海、空军、要塞司令等，联名于四日以“支”电响应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冬”电的号召，说：“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曲，……俱不足以压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唯有依从钧部、钧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云云。旋即由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颁发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

蒋介石本人则伪装镇静，在六月八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会上表示：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向西南提出五项条件的事；并表示决不相信外边一切谣言，相信西南必能和中央团结一致，企图用这来安定各方舆论，缓和反蒋气氛。于是，蒋一面布置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商讨，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中向两广调集军队，并设法分化和收买陈济棠内部，又假惺惺地和西南文电往还。蒋首先复陈济棠一电说：今天要救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要他们的“部队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望推派负责人员来京，共同商决一切”。同时，蒋又于九日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以“佳”电电复西南各委员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中央秉承

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決議，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針，遵循不渝。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內，召开全体执监會議，于一貫方針之下，进为步驟緩急之謀。希飭所屬部队，勿因輕率之自由行动，致誤救亡大計”云。蔣企图以开会商討为名，制止西南部队自由行动。

西南方面立即发出“真”(十一)电，针对“佳”电内容逐一駁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指出：“中央若果有御侮决心，則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見中央向北开动一兵一卒，而反將北方及中部各省駐軍紛紛向粵、桂压迫？御侮不可徒托空言，救亡必須見諸事实。华北危机既迫，唯有实行抗战，始克救亡，决非从容坐談之时。只須中央领导抗日，則全国統一之势立成，一致御侮之效可睹。乃不此之图，反欲一面以召集全体會議搪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之要求；一面調集重兵，压迫湘、粵、桂之四境，是对外之实效未图，而內战之危机先啓。此不独授人瑕隙，自召分崩亡国之禍，即在目前矣。何去何从，惟鈞会实利图之。”

两广方面除徹底駁复“中央”外，同时又假意地遇事向“中央”請示，报以“根据一、四两集团軍將領慷慨請纓，并請改頒軍号，以便出师抗日。当經屬部屬会联席會議通过決議：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軍，并頒发印信令遵在案”；并报以“复据一、四集团軍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会报，两粵部队悉数可調遣北上；后方治安，两省民众武装足可巩固，特請中央指令北上路綫及集中地点，并对北上部队餉糈械彈源源接济”。两广方面就这样来进一步逼請“中央”领导并支持抗战。

同时，两广方面为爭取輿論同情，并宣傳主張开放民众集会、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权利；主張取消中、日間所訂非法屈辱協

定；在两广各地发动群众示威，宣傳抗日救国。当时的宣傳口号，除喊出“日本是我们的死对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經濟絕交！”外，还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內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为要抗日救国，必須全国动员！”等口号。并由各地党部、群众团体，紛紛电請“中央”順应輿情，速調南下的部队，兼程北上抗日。在七月初还組織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北上請愿代表团，請“中央”回师抗日。这个代表团到达香港后，住了好几天，因中外輪船公司受南京指使，拒絕卖船票給他們，只好中途折回广州。又为不放弃一切宣傳机会，还派了五位中委——黃麟書、邓青阳、崔广秀、李任仁、李綺庵北上，出席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項救亡方案（大体是：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廢除中日間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之类等，詳情記不起了），准备作誓死的力爭。

在双方互相攻訐、战事密云不雨的醞釀中，蔣介石的阴謀逐步一幕幕地搬出来了。为了給他御用的二中全会打气，他首先使收买来的广东空軍人員黃志剛等四十多人于七月六日駕机投蔣。据說为了收买这批空軍，蔣介石花了比买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多的錢。最初蔣認為太不合算，不肯出那多的錢，但听到經紀这项买卖的人說，把陈济棠的空軍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問題，而是搞垮陈济棠在广东的全部实力的問題，在軍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錢的数量来衡量的，蔣才答应了。

蔣把陈的空軍收买成功后，就指使这些空軍人員黃志剛等通电指責陈、李、白等借抗日之名，实行反叛“中央”，并說他們有“派潘宜之赴日要求日軍进占华北，扰閩南，牵制中央”等勾結日本的行为（那时两广为了反蔣，确有一部分人主張利用日本浪人搞